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企业就业变动

何欢浪¹ 张凤菊¹ 张娟²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上海 201620; 2.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在 WTO 框架下, 合规使用对外反倾销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 做好“稳就业”工作, 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就业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考察了反倾销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就业变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对外发起反倾销同时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与“抑制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 且该估计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假设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分析发现, 反倾销保护主要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创造。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 对外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私营企业和西部内陆地区企业的就业创造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意味着, 中国政府可以在 WTO 框架内采用反倾销措施抵制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 通过就业创造做好“稳就业”工作。

关键词: 对外反倾销; 就业变动;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双重差分估计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21)05-0015-11

DOI:10.13269/j.cnki.ier.2021.05.002

一、引言

反倾销保护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规”措施, 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与此同时, 也有大量国外企业采取倾销等不正当手段和国内企业开展市场竞争^[1], 导致中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秩序不断扭曲。为了保护国内受到倾销损害的产业并提高其竞争力, 我国不得不积极采取反倾销措施来进行应对。现有文献大多从企业的生产率、成本加成和创新等角度研究对外反倾销的产业救济效果, 但对反倾销与就业保护的研究较少。事实上, 对外反倾销除了对企业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外, 更深处的是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而企业的就业变动不仅与劳动者的就业风险息息相关, 也对劳动者间接参与全球化的福利起了决定作用。在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冲击下, 中国的就业压力显著加大, 做好就业工作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中之重。研究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规使用对外反倾销措施, 保护国内市场环境的公平性, 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 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以往文献, 学者们对反倾销保护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主要持有“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观点。支持“就业创造”的文献认为对外反倾销通过对进口的最终品征税等行为, 抑制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竞争力的上升, 这种反竞争效应会促进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2-3], 促使受到保护的国内企业利用进口减少、价格上升的机会, 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对劳动力的

收稿日期: 2021-03-12; 修回日期: 2021-07-16

作者简介: 何欢浪(1981—), 男, 浙江诸暨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张凤菊(1995—), 女, 山东济宁人, 通讯作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张娟(1992—), 女, 安徽合肥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JL04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2020EJB008);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18SG51)

吸收^[4-5]。而支持“就业破坏”的文献认为对外反倾销会导致国内企业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国外产品的进口成本增加,进而导致企业的利润锐减,促使企业不断缩小投资规模,减少对劳动力的吸收。还有一些文献认为对外反倾销可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报复,使得出口企业的出口市场受到冲击^[6],进而导致企业减少对劳动力的投入。

关于对外反倾销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研究中,有较多文献考察了对生产率、绩效、成本加成和创新等企业行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反倾销保护存在一定的产业救济作用,如:谢建国和潘超^[7]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反倾销调查对我国涉案企业的影响,认为对外反倾销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滞后期;何欢浪等^[8]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来探讨反倾销保护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对外反倾销对高生产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水平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反倾销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救济效果,如鲍晓华和陈清萍^[9]研究发现反倾销会导致下游企业出口额和出口概率的不断降低,Pierce^[10]研究发现反倾销并未对企业真实生产率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此外,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企业就业变动。首先是关于企业就业变动的度量方式,以往文献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法来度量: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采用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值来进行表示^[11];第二种方法是用两期就业人数的差值表示^[12];第三种方法则是使用企业在上期到当期之间的就业变化量与其就业规模的比值(就业规模一般采用两期就业人数的均值)表示,并将其分解成就业创造率与就业破坏率来讨论^[13]。基于对以上三种方法的比较,我们发现用企业在两期的就业变化量与其就业规模的比值构建企业的就业变动,并将其分解成就业创造率与就业破坏率,不仅能表现就业随时间的变动,也能更好地衡量就业的构成和方向^[13]。所以本文参考马弘等^[13]的方法来衡量企业的就业变动,并展开研究。其次是关于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文献从贸易自由化、出口、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汇率及对外投资等角度来研究其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将企业就业变动分解为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其中毛其淋和许家云^[14]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创造”和“抑制就业破坏”两种途径;席艳乐和王开玉^[15]将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联系起来,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就业创造或破坏取决于企业生产率的高低。

从已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大多以企业的生产率、成本加成及创新等为研究重点来探究反倾销的保护效应,但针对企业就业变动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宏观讨论层面,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本文是对已有文献的补充。具体而言,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对外反倾销数据库进行匹配,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就业变动。研究发现:(1)对外发起反倾销同时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与“抑制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变动。(2)对外反倾销主要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创造。(3)相对于国有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外反倾销更多地促进了私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创造;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反倾销更多地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企业的就业创造。

与既有中国对外反倾销与企业就业变动之间关系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创新性地用细化的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差异化影响,扩展了现有文献中关于对外反倾销影响的研究范围。第二,从实证方法的角度,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对外反倾销数据库进行匹配,采用双重差分的估计方法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起了一定作用。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在WTO框架下合规地实施反倾销措施、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二、中国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 对外反倾销的就业创造效应

对外反倾销可以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企业的就业创造。当一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后,反倾销税等

措施会提高进口品价格^[2],降低中间产品进口量,削弱国内市场上来自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使其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大大缩水^[1]。一方面,这让国内边际上本来可能会被淘汰的低生产率企业得以继续生存,而国内市场份额上升会促使这些企业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投入^[5]。另一方面,进口品价格上升对于本国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上升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这种反竞争效应会促进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3]。企业出于规模经济的需要,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5],提高对劳动力的投入。

(二) 对外反倾销的就业破坏效应

对外反倾销通过成本抑制效应造成国内企业的就业破坏。一国对外反倾销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促进国外产品进口价格的上升,这会导致国内企业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国外产品的进口成本增加^[16],进而导致企业的利润锐减。企业为了能够维持经营状态,会减少劳动力的雇佣。此外,一国在对外发起反倾销后可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报复^[5],使得出口企业市场需求下降,出口减少,直至退出出口市场。企业为了维持经营,也会缩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降低对劳动力的投入。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对外发起反倾销同时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与“抑制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途径影响了企业的就业变动。

从贸易救济的角度来看,对外反倾销会通过改变保护行业或企业的生产和贸易行为来影响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盈利能力。具体来说,反倾销保护通过反竞争效应促使进口品价格的上升^[2],这会使得低生产率企业继续生存,高生产率的企业市场份额增加。因此,受到保护的国内企业能够利用进口减少、价格上升的机会,扩大生产规模^[4-5],从而有更大的需求去扩大对劳动力的吸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 对外反倾销主要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创造。

(三) 对外反倾销对不同类型企业就业变动的异质性分析

首先,企业的劳动力依赖程度会因其要素密度的不同而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其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容易受到影响。且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更大,进而导致其更易受到外部某种政策的冲击^[17]。此外,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依靠劳动力优势嵌入行业的生产链,因此在面对反倾销导致的国内市场转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会更加明显。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 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外反倾销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变动。

其次,企业的所有制不同,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国人口基数大,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会因为其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政策联系或负担,而不得以任何经济原因随意削减职工数量^[18]。同时,对外反倾销主要通过对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进行削弱来促进国内市场环境不断完善。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大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9],其为获得更多收入会抓住市场环境改善的时机,进一步扩大生产,加大劳动力投入力度。另外,一些外资企业为了应对反倾销,也会选择直接在我国国内投资建厂^[19],因此会提高外资企业的就业创造。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4: 相对于国有企业,对外反倾销将更多地推动私营企业增加就业机会。

最后,市场及制度环境会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企业而言,内陆地区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更容易受到影响。进一步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面对反倾销导致的国内市场转变时,其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要大一些,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也会更加明显。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5: 对外反倾销对西部内陆地区就业创造的影响大于东部沿海地区。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一) 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 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反倾销数据库两个数据库^①。首先, 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进行了删除处理, 并对企业就业变动、生产率等指标进行了简单测算。其次, 中国对外反倾销数据库将中国 1997 至 2015 年期间对外发起的反倾销案例数据包含在内, 提供了反倾销发起时间、被诉讼国、反倾销的对象产品描述及产品 HS 码、反倾销初裁等详细信息。其中, 中国在 1999—2006 年对外发起反倾销案例共 143 个, 对调查国的差异予以忽略, 中国实际发起 45 个反倾销案例^②。

本文参考 Konings and Vandenbussche^[21]、宋华盛和朱小明^[3]及何欢浪等^[8]的实证方法, 首先, 将反倾销数据库中产品的八位或十位 HS 码提取到六位层面, 利用联合国不同年份的 HS 码转换表, 将 HS2002、HS2007 代码转换为 HS1996 产品代码, 若同一种 HS 六位码产品先后在不同年份都被反倾销调查且都被确定了肯定性终裁, 则取第一年为该产品受到反倾销冲击的年份。其次, 利用 Brandt *et al.*^[22]提供的 1996 年产品 HS 码和 2003 年的四位行业分类转换表, 将受到反倾销保护的产品对应到其所属的四位国民经济行业。最后, 为了控制处理组与控制组的行业特征差异, 则将至少包含一个受到反倾销保护的六位码产品的四分位行业内企业视为处理组, 将与处理组行业前两位行业码相同且未曾受过反倾销保护的四分位行业内企业视为控制组。如果在反倾销发起之后, 企业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发生转换, 那么本文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会产生偏误, 因此, 本文剔除了在样本期内转换行业的企业样本。

(二) 指标构建

本文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考虑反倾销对就业的影响, 关于企业就业变动的指标构建, 本文主要参考马弘等^[13]的方法来定义就业规模的变动率^③:

$$FJFlow_{ijt} = \frac{\Delta jobs_{ijt}}{0.5(jobs_{ijt} + jobs_{ijt-1})} \quad (1)$$

其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首先来分析分子 $\Delta jobs_{ijt}$ 表示企业当期的从业人数与上期的从业人数之间的差值, 其次分母中 $jobs_{ijt}$ 表示当期企业的从业人数, 我们将上期与本期就业人数的总和取均值来排除异常值对本文结果的影响, 使得就业变动率在 $[-2, 2]$ 之间取值。其中 $FJFlow_{ijt} = 2$ 表示新企业的进入, 而 $FJFlow_{ijt} = -2$ 表示旧企业的消亡。但是由于本文删除了那些年主营业务收入未超过 500 万元的企业, 新进入的企业可能在过去未达到标准现在才达到标准, 因此, 可能会出现对数据的高估。基于减少由样本选择偏误所带来的计算误差的考量, 本文只选取就业变动率区间为 $(-2, 2)$ 的企业^[13]。

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 本文将就业规模的变动率区分为就业创造率 ($FJCreation_{ijt}$) 与就业破坏率 ($FJDestruction_{ijt}$) 来探究中国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变动的作用机制。

$$FJCreation_{ijt} (\text{就业创造率}) = \max(FJFlow_{ijt}, 0) \quad (2)$$

$$FJDestruction_{ijt} (\text{就业破坏率}) = \max(-FJFlow_{ijt}, 0) \quad (3)$$

如公式 (2) 和公式 (3) 所示, 如果某一企业某一年的 $FJFlow_{ijt}$ 比 0 大则表示创造了就业, 若比 0 小则表示破坏了就业。与上一期相比, 如果一个企业的就业是增多的, 表现为 $\Delta jobs_{ijt} > 0$, 则 $FJFlow_{ijt}$ 大于 0, 那么其对应的就业创造率为原值, 就业破坏率就为 0。如果一个企业的就业是减少的, 表现为 $\Delta jobs_{ijt} < 0$, 则 $FJFlow_{ijt}$ 小于 0, 那么就业创造率为 0, 而就业破坏率取数值的相反数^[23]。

(三) 实证策略

为了进一步实证检验中国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的影响, 并基于前文假设, 本文借鉴何欢浪等^[8]的计量模型, 构建如下 DID 计量模型:

$$FJFlow_{ijt+1} = \beta_0 + \beta_1 AD_{jt} + \gamma X_{ij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模型(4)中 i, j 分别表示企业及行业 t 表示年份。其中, 因变量 $FJFlow_{ijt+1}$ 表示企业的就业变动率, 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 为了探究对外反倾销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对外反倾销的就业破坏效应, 将就业变动率 ($FJFlow_{ijt+1}$) 区分为就业创造率 ($FJCreation_{ijt+1}$) 与就业破坏率 ($FJDestruction_{ijt+1}$) 来讨论; AD_{jt} 是本文的自变量, 表示 j 行业在 t 年是否受到反倾销保护, 即处理组行业内企业在受到反倾销保护后的年份取 1, 在受到反倾销保护前的年份取 0, 控制组在样本期内取 0。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加入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X_{ijt} : 首先, 企业的工资水平表示企业的生产成本水平, 那么企业的工资增加则代表着劳动力成本增加, 该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就会下降^[11], 所以本文采用应付工资比上从业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工资水平 ($lnwage$), 进而对企业工资水平对就业变动的影响予以控制^[11, 16]。其次, 随着销售量的增加, 企业对就业的需求也会增加^[14], 本文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值衡量企业销售额 ($lnsale$) 来控制市场需求变化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再次, 企业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24], 本文将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比上职工从业人数的对数值作为资本劳动比 ($lnkl$) 来控制资本替代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最后, 技术对工人的替代会伴随着企业生产率的增加而产生, 进而会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25], 所以本文控制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δ_i 是企业固定效应, λ_t 是年份固定效应。表 1 是本文主要变量的解释和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平均数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变动率	$FJFlow_{ijt} = \frac{\Delta jobs_{ijt}}{0.5 jobs_{ijt} + 0.5 jobs_{ijt-1}}$	0.023	0.362	-1.998	1.984
就业创造率	$\Delta jobs_{ijt} > 0$ 时的 $FJFlow_{ijt}$, 若为正数则取正值, 若为负数则取 0	0.118	0.247	0	1.984
就业破坏率	$\Delta jobs_{ijt} < 0$ 时的 $FJFlow_{ijt}$, 若为负数则取正值, 若为正数则取 0	0.093	0.220	0	1.998
全要素生产率	以 LP 方法估计的生产率	6.682	1.107	1.758	9.191
工资水平	应付工资与全部职工人数之比的对数值	2.420	0.701	0	8.117
资本劳动比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比上全部职工人数的对数值	3.757	1.242	0	10.317
企业销售额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值	10.361	1.347	0	18.728

注: 上述变量取对数前均加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每一列都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列(1)、列(3)、列(5)只考虑反倾销一个解释变量, 列(2)、列(4)、列(6)加入了控制变量。首先来分析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发现对外反倾销对企业的就业变动回归所得到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中国对外反倾销对于企业的就业变动有着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 将就业变动率 ($FJFlow_{ijt+1}$) 区分为就业创造率 ($FJCreation_{ijt+1}$) 与就业破坏率 ($FJDestruction_{ijt+1}$) 来对对外反倾销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析。如表 2 第(3)列和第(4)列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就业变动率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破坏率
AD	0.018 *** (3.583)	0.012 ** (2.105)	0.028 *** (8.453)	0.024 *** (6.563)	-0.009 *** (-3.057)	-0.005 * (-1.652)
tfp		-0.017 *** (-11.010)		-0.007 *** (-7.294)		0.010 *** (10.860)
$lnwage$		-0.008 *** (-3.504)		-0.006 *** (-3.868)		0.002 * (1.746)
$lnsale$		0.067 *** (29.876)		0.030 *** (20.920)		-0.037 *** (-28.392)
$lnkl$		-0.031 *** (-17.704)		-0.012 *** (-11.166)		0.018 *** (18.207)
$Constant$	0.079 *** (27.573)	-0.207 *** (-8.299)	0.163 *** (89.122)	0.114 *** (7.070)	0.083 *** (50.030)	0.324 *** (22.490)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18 246	262 166	318 246	262 166	318 246	262 166
R^2	0.006	0.014	0.017	0.025	0.009	0.016

注: 括号里的数值表示 t 值, ***, **, * 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以就业创造率为因变量,从第(4)列完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外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对外反倾销会抑制国内市场来自外国进口品的竞争,这种反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3],致使国内边际上本来可能会被淘汰的低生产率企业生存下来,且国内市场竞争效应的减弱促进受到保护的高生产率的企业市场势力增加,企业利润提高,进而使得企业具有更强的成长能力^[26]。因此,企业会将生产规模扩大,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由表2第(6)列可以看出,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破坏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对外反倾销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就业破坏力。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反倾销保护提高了企业的成长性^[26],同时有利于企业增加销售量和扩大生产,因此在总体上抑制了企业对职工人数的削减。最后,将表2第(2)列、第(4)列和第(6)列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对外反倾销通过“促进就业创造”与“抑制就业破坏”两个途径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变动,正好验证了前文所提的假说1。

由第(2)列与第(4)列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就业变动和就业创造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以认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小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技术与用工之间的替代作用则会导致企业对职工的需求随着它的提高而减小^[11]。企业销售额的回归系数也为正,说明销售额代表着市场的需求,销售额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将产出规模扩大来促进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14]。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是因为资本替代企业就业的可能性会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而变大,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则是因为工资的增加代表着劳动力成本增加^[11]。

(二)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根据对外反倾销政策的实施时间来考察对外反倾销政策实施前3年、前2年、前1年、当年、后1年、后2年、后3年、后4年对企业就业创造率的政策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2)列到第(5)列逐一放入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在反倾销发起前的时期,受到反倾销保护的行业内企业和未受到反倾销保护的行业内企业的就业变动没有明显不同,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的成立。进一步考虑反倾销保护对企业就业创造影响的动态效果,发现反倾销对企业的就业创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稳健性检验

1. 指标替换。采用当期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就业变动。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④。

2. 调整样本。由于样本中部分企业就业变动率比较高,为了排除异常值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将企业就业变动高于95%分位样本去除。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估计结果不受异常值的影响^⑤。

表3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1) 就业创造率	(2) 就业创造率	(3) 就业创造率	(4) 就业创造率	(5) 就业创造率
反倾销前3年×是否	-0.006	-0.009	-0.009	-0.012	-0.012
受反倾销保护	(-1.132)	(-1.629)	(-1.637)	(-1.039)	(-1.088)
反倾销前2年×是否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受反倾销保护	(-1.138)	(-1.173)	(-1.143)	(-1.161)	(-1.176)
反倾销前1年×是否	-0.010	-0.011	-0.011	-0.007	-0.007
受反倾销保护	(-1.130)	(-1.179)	(-1.124)	(-1.103)	(-1.033)
反倾销当年×是否	0.008**	0.008**	0.008**	0.007**	0.008**
受反倾销保护	(2.691)	(2.650)	(2.729)	(2.699)	(2.653)
反倾销后1年×是否	0.010*	0.010*	0.010*	0.007*	0.007*
受反倾销保护	(1.886)	(1.862)	(1.859)	(1.628)	(1.603)
反倾销后2年×是否	0.008*	0.008*	0.008*	0.006*	0.006*
受反倾销保护	(1.849)	(1.831)	(1.826)	(1.653)	(1.648)
反倾销后3年×是否	0.010*	0.009*	0.009*	0.008*	0.008*
受反倾销保护	(1.964)	(1.949)	(1.824)	(1.865)	(1.994)
反倾销后4年×是否	0.009*	0.009*	0.009*	0.004*	0.005*
受反倾销保护	(1.868)	(1.830)	(1.903)	(1.552)	(1.571)
Constant	0.163*** (89.015)	0.159*** (55.077)	0.152*** (40.879)	-0.104*** (-7.583)	-0.065*** (-4.63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318 246	290 539	290 311	262 453	262 166
R ²	0.017	0.017	0.017	0.020	0.021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从第(2)列开始,依次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处及下文将不再汇报。

3. 控制行业时间趋势。本文将行业特定的线性时间趋势项($\alpha_i t$)加入 DID 模型进行估计,来对未观测到的行业特定因素是否影响本文估计结果进行检验^[27]。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保持一致,也表明中国对外反倾销对国内受保护行业内企业的就业创造起了促进作用^⑥。

五、影响机制和扩展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指出,对外反倾销导致的进口品价格上升会对本国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上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反竞争效应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企业的就业创造。但受数据限制,本文数据库中缺少产品价格的数据,我们无法利用此数据来分析对外反倾销的反竞争效应。因此,本文首先将固定资产合计净值取

对数,用来表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次,将工业销售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取对数来分别表示企业的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和主营收入,以反映企业的销售额和产值;最后,通过将反倾销保护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对外反倾销对企业规模的反竞争效应,进而说明对企业就业创造的反竞争效应。如表 4 所示,第(1)列到第(4)列分别是反倾销对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正向地促进了国内企业的销售和产出。反倾销保护削弱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3],进一步导致了国内企业销售和产出的增加以及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得以实现,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创造,即反倾销保护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了国内企业就业创造。

此外,本文构建行业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来验证反竞争效应的存在,其计算公式如下:

$$hhi_{jt} = \sum_{i=1}^n (sale_{ijt} / \sum_{i=1}^n sale_{ijt})^2 \quad (5)$$

其中, $sale_{ijt}$ 代表的是四位码行业 j 内企业 i 的销售产值, $\sum_{i=1}^n sale_{ijt}$ 则代表四位码行业 j 内所有企业销售产值的总和,即整个行业的总销售产值。而 hhi 代表企业的市场份额或竞争程度,其越小则代表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企业不得不通过削减员工人数或削减工资来应对加大的竞争压力,以减少成本来获得更大的利润水平^[3]。

如表 5 所示,本文根据 hhi_{jt} 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竞争程度行业

和低竞争程度行业两种类型。其中第(1)列至第(3)列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第(4)列到第(6)列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可以发现无论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是高还是低,对外反倾销对其就业创造的促进作用均显著,这就意味着对外反倾销通过对国内市场竞争进行压制,导致企业的市场

表 4 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工业销售收入	(2) 固定资产投资	(3) 工业增加值	(4) 主营收入
<i>AD</i>	0.013 *** (4.617)	0.018 *** (3.248)	0.040 *** (8.911)	0.021 ** (2.181)
<i>Constant</i>	1.296 *** (105.370)	2.968 *** (121.101)	1.423 *** (71.659)	8.831 *** (438.3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289 903	289 631	238 380	158 412
<i>R</i> ²	0.349	0.389	0.658	0.363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 t 值,***、**、* 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表 5 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机制分析:考虑国内行业竞争程度

变量	低竞争程度行业			高竞争程度行业		
	(1) 就业变动率	(2) 就业创造率	(3) 就业破坏率	(4) 就业变动率	(5) 就业创造率	(6) 就业破坏率
<i>AD</i>	0.019* (1.484)	0.027 *** (3.353)	-0.017 ** (-2.203)	0.007 (0.874)	0.021 *** (4.094)	-0.001 (-0.111)
<i>Constant</i>	-0.386 *** (-5.871)	-0.058 (-1.373)	0.328 *** (7.978)	-0.404 *** (-14.537)	-0.072 *** (-3.984)	0.331 *** (20.8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78 155	78 155	78 155	184 011	184 011	184 011
<i>R</i> ²	0.063	0.092	0.067	0.010	0.018	0.009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 t 值,***、**、* 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势力得以提升。但对外反倾销仅对于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就业破坏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这说明处于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虽然也会因对外反倾销的反竞争效应而增加其对劳动力的吸收,但是明显不如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反倾销保护通过抑制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竞争力的上升促进了国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3],这使得本身处于竞争程度较低行业的企业会抓住时机将生产规模扩大,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以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而处于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虽然会在市场竞争程度下降的情况下改变劳动力投入来获取更多的市场势力,但是其本身的竞争程度较高,市场份额比较小,改变的空间不如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内企业明显。以上结果再一次证明,对外反倾销通过反竞争效应创造了国内企业就业,也再一次验证了前文的假说2。

最后,反倾销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口成本来造成企业的就业破坏。但是由于本文数据库中缺少进口成本的数据,因此,本文参考辛大楞^[11]的研究将样本所在的行业按照 OECD 的行业分类方法分成了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类。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反倾销对低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就业破坏率显著为负,但对中高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内的企业就业破坏的抑制作用却不显著。可能存在的原因,我国中高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国外产品依赖性比较高,而反倾销导致国外产品进口价格上升,使得这些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28]、利润减少,企业为了维持经营,不得不缩减投资规模,减少对劳动力的吸收,造成就业破坏。

(二) 反倾销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本文参考刘贯春等^[29]的做法,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相较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变动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对外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与前文的假说3一致。原因可能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依靠劳动力优势嵌入行业的生产链,因此在面对反倾销导致的国内市场转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会更为明显。

(三) 反倾销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本文参考韩国高等^[30]的做法,将样本企业区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类型。结果如表8所示,对外反倾销对私营企业的就业变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主动反倾销对国内私营企业就业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而验证了假说4。可能存在的原因是,相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会因

表6 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破坏的机制分析:
考虑国内行业技术水平

变量	低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	中高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1)	(2)	(3)	(4)
	就业破坏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破坏率
AD	-0.007*** (-6.731)	-0.131*** (-5.694)	0.008 (1.219)	-0.007 (-1.438)
Constant	0.350*** (18.338)	0.359*** (12.009)	0.342*** (13.008)	0.358*** (10.2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9 017	57 895	50 199	125 055
R ²	0.018	0.018	0.015	0.016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表7 对外反倾销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

变量	非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1)	(2)	(3)	(4)	(5)	(6)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AD	0.006 (0.815)	0.022*** (4.305)	-0.004 (-0.980)	0.034*** (3.139)	0.038*** (5.540)	-0.010 (-1.568)
Constant	-0.704*** (-18.698)	-0.155*** (-6.191)	0.548*** (26.699)	-0.702*** (-16.827)	-0.216*** (-8.316)	0.481*** (19.1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08 451	108 451	108 451	153 715	153 715	153 715
R ²	0.010	0.018	0.018	0.012	0.023	0.014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其特殊地位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如保增长、促就业等)在面对反倾销的冲击时就业变动比较小,而且国有企业职工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隐形合约,在这种合约体制下,国有企业不得以经济原因随意裁减职工^[18]。其次,对外反倾销主要通过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进行抑制,改善国内市场环境。私营企业的忧患意识使其在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后为提高收入而进一步扩大生产^[9],加大劳动力投入力度。因此,对外反倾销将更多地推动私营企业增加就业机会。

(四) 反倾销对不同地区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本文分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两个地区讨论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表9的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我国对外反倾销显著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受保护企业的就业变动,且对西部内陆地区企业就业创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5。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企业而言,内陆地区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面对反倾销导致的国内市场转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会更加明显,即对外反倾销主要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就业创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实证层面对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影响国内企业就业变动进行了探究,并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所有制类型及不同地区下反倾销保护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对外发起反倾销同时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与“抑制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变动。第二,对外反倾销主要通过减少来自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来促进企业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的提升,促使国内企业增加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的就业创造。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外反倾销更多地促进了私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创造;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反倾销更多地推动了西部内陆地区企业增加就业机会。本文补充了关于反倾销保护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研究,并为我国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做好“稳就业”工作。政府应合理地采用反倾销措施来抵制国外企业过度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对在国内市场发展的国外企业的监控和规范,提高企业在合理的政策预期下调整企业劳动力水平的有效性。第二,贸易政策调控与配套扶持政策双管齐下,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政府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同时,还应该统

表8 对外反倾销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

变量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1)	(2)	(3)	(4)	(5)	(6)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AD	0.020 (1.295)	0.019** (2.038)	-0.013 (-1.308)	0.013* (1.956)	0.026*** (5.953)	-0.006* (-1.727)
Constant	-0.340*** (-6.842)	-0.024 (-0.842)	0.313*** (10.093)	-0.449*** (-16.743)	-0.077*** (-4.367)	0.369*** (24.6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0 471	50 471	50 471	209 139	209 139	209 139
R ²	0.007	0.007	0.014	0.015	0.027	0.017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表9 对外反倾销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5)	(6)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就业变动率	就业创造率	就业破坏率
AD	0.009 (1.334)	0.024*** (5.590)	-0.002 (-0.504)	0.021* (1.667)	0.032*** (4.065)	-0.009* (-1.240)
Constant	-0.687*** (-23.848)	-0.163*** (-8.622)	0.521*** (31.895)	-0.812*** (-18.806)	-0.229*** (-8.528)	0.582*** (22.7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85 768	185 768	185 768	76 398	76 398	76 398
R ²	0.020	0.027	0.025	0.017	0.021	0.021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分别表示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筹国内外市场情况,将反倾销政策的时间点把握好,出台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使得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得到长期发挥。第三,鼓励企业摒弃“坐等靠”观念,发展企业竞争力。国家对外发起反倾销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政府应鼓励企业改变享受反倾销等政策保护的思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合理调整生产投入。此外,企业也应提升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让就业质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注释:

- ①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本文参考了聂辉华和贾瑞雪^[20]的方法剔除了一些样本。同时,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两期就业人数的差值与两期就业人数的0.5加权平均值的比值,不考虑企业新生与退出,将1998年与2008年样本去除,且在实证中作滞后一期处理,所以本文样本期限限制在2000—2007年。
- ②根据案例编号,有的反倾销案例是同一产品但是针对多个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例如1999年针对产品丙烯酸酯的反倾销,其反倾销对象国就包括了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所以,抛开调查国差异仅针对反倾销案例产品来说,中国实际发起反倾销45例。
- ③本文选用就业变动率区间为(-2, 2)的企业,不考虑企业新生和退出。
- ④由于篇幅有限,回归结果在此将不再汇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⑤由于篇幅有限,回归结果在此将不再汇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⑥由于篇幅有限,回归结果在此将不再汇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 [1]苏振东,刘璐瑶,洪玉娟. 对外反倾销措施提升中国企业绩效了吗[J]. 财贸经济, 2012(3): 68-75.
- [2]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J]. 世界经济, 2015(5): 36-58.
- [3]宋华盛,朱小明.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12): 94-107.
- [4]沈瑶,朱益,王继柯. 中国反倾销实施中的产业关联研究:以聚氯乙烯案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3): 83-87.
- [5]毛其淋,盛斌.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J]. 经济研究, 2013(4): 16-29.
- [6]PRUSA T J. On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anti-dumping[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34(3): 591-611.
- [7]谢建国,潘超. 对外反倾销提升了国内上市企业绩效吗?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7): 123-134+137.
- [8]何欢浪,张娟,章韬.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企业创新——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0(2): 4-20.
- [9]鲍晓华,陈清萍.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下游企业出口? ——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9(2): 749-770.
- [10]PIERCE J R. Plant-level responses to antidumping duties: 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2): 222-233.
- [11]辛大楞.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就业[J]. 产业经济研究, 2018(5): 89-100.
- [12]李胜旗,毛其淋.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就业与工资[J]. 世界经济, 2018(6): 28-52.
- [13]马弘,乔雪,徐嫫.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J]. 经济研究, 2013(12): 68-80.
- [14]毛其淋,许家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J]. 经济研究, 2016(1): 69-83.
- [15]席艳乐,王开玉.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015(1): 61-72.
- [16]朱钟棣,鲍晓华. 反倾销措施对产业的关联影响——反倾销税价格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J]. 经济研究, 2004(1): 83-92.
- [17]史青,李平. 再议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J]. 财贸经济, 2014(10): 83-93.
- [18]李春顶. 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研究(1997—2007) [J]. 南方经济, 2011(5): 3-16.
- [19]鲍晓华. 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J]. 经济纵横, 2004(1): 16-19.

- [20] 聂辉华, 贾瑞雪. 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J]. 世界经济 2011(7): 27-42.
- [21] KONINGS J, VANDENBUSSCHE H.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firms to trade protec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2): 371-383.
- [22]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WANG L, et al.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 2784-2820.
- [23] DAVIS S J, HALTIWANGER J. G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r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3): 819-863.
- [24] 魏浩, 李晓庆.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J]. 统计研究 2018(1): 43-52.
- [25] MESCHI E, TAYMAZ E, VIVARELLI M.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labor demand: a firm-level analysis for turkey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6, 152(4): 655-680.
- [26] ANGELINI P, GENERALE A. On the evolution of firm size distribu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426-438.
- [27] LIU Q, QIU L D.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tent filing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3: 166-183.
- [28] 孟宁, 周彦宁, 马野青. 反倾销、多产品企业与出口生存风险[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5): 30-44.
- [29] 刘贵春, 叶永卫, 张军. 社会保险缴费、企业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152-169.
- [30] 韩国高, 邵忠林, 张倩. 外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稳就业”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5): 81-95.

(责任编辑: 戴芬园)

China's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nd firm's job flows

HE Huanlang¹, ZHANG Fengju¹, ZHANG Juan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Using foreign anti-dumping measur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framework to protect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domestic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o effectively stabilize employment.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China's anti-dumping measures upon the job flows of domestic firms. Furthe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anti-dumping on firms' job flow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y,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unch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hanges in job flows through two approaches: promoting firms' job creation, and restraining firms' job destruction. After considering the parallel trend hypothesi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remain robus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anti-dumping protection mainly promotes firms' job creation through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Further expan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foreign anti-dumping measures have a more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job creation of labor-intensive firms, private firms, and firms in the western inland areas. This paper's conclusion impli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adopt anti-dumping measures within the WTO framework to resist dumping by foreign companies, and effectively stabilize employment through job creation.

Key words: anti-dumping; job change; job creation; job destruc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